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课题后续研究成果

地方新建本科院校 协同创新与协同育人 模式研究

贺金玉 著

ANG XINJIAN
KE YUANXIAO
TONG CHUANGXIN
XIETONG YUREN
SHI YANJIU

山东大学出版社

· 013034367

G649.2
228

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成果

地方本科院校创新性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季桂起 宋伯宁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641669

G649.2
228

130343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方本科院校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季桂起,宋伯宁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607-4758-3

I. ①地… II. ①季… ②宋… III. ①地方高校-人才培养-培养模式-研究-中国 IV. ①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6938号

责任编辑 尹凤桐

封面设计 牛 钧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20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规 格 720毫米×1000毫米

23.25印张 428千字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前 言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经历了世纪之初的大规模扩张之后,迅速成长起了一大批地方性本科院校。这些学校的数量在全国高校中占据半壁江山,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中国高等教育的战略格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们为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成为中国赖以实现强国富民及民族复兴之梦的重要人才培养基地与人力资源输出基地。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转型与提升,随着社会改革的持续深化与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家战略的调整,对创新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2006年1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宣布了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中国科技创新的基本指标是,到2020年,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要从39%提高到60%以上,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从1.35%提高到2.5%。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把对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也为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因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要有一大批符合创新型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来承担起“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任,然而我国现行的以知识、能力传授为主的教育模式,是无法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所以,要想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必须改造我国现行的教育模式,尽快地通过建立以创造力培养为主的教育模式,培养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创新性人才”来满足“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

为此,一些高水平大学即“985”、“211”大学纷纷提出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计划”,如北京大学推出的“元培计划”、清华大学举办的“清华学堂”、复旦大学实施的“望道计划”、浙江大学举办的“竺可桢创新人才培养班”、山东大学创办的“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等。这些高水平大学着眼于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高端人才,采用优质资源重点投入的方式,进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掀起了一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热潮。然而,在这股热潮中,我们感觉有一个重要问题似乎被忽略了,这就是国家发展战略所需要的相当数量的地方性、区域性、行业性、职业性的创新人才培养,没有很好地提到高等教育的议事日程上来。

其实,在国家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中,地方性、区域性、行业性、职业性的创新人才是一个非常重要且不能被忽略的部分。我们认为,合理的创新型人才结构应该是一个多元结构:最高端是少数的拔尖创新人才,他们担负着为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发展提供原创性的思想、理论、科技、学术及知识的责任;下面是一大部分的创新性应用型人才,他们的任务是在地方、区域、行业、职业的应用性工作中提供创造性的理念、思路、方法、知识及技能。对国家发展来说,这几个方面的创新型人才都不可或缺。他们都共同担负着民族振兴的时代使命。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各级各类学校都负有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责任。有的高教研究专家也曾提出:创新型人才是指具有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人,它是相对于不思创造、缺乏创造能力的比较保守的人而言的,这同理论型、应用型、技艺型等人才类型的划分不仅不是并列的,而且是兼容的。事实上,人才培养的规律要求不论是哪种类型的人才皆须具有创造性。

从以上的认识出发,德州学院在2010年即提出学校人才培养的重点将放在对“创新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上,以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引领,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我们认为,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内涵有以下几点:第一,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应该是体现了高水平

素质教育的人才,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高质量的综合素质,包括具有良好的学术操守、职业道德、自觉的团队精神和基本的公民素质等,然后才是对社会需求适应对路的应用型人才。第二,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应该是体现了深厚、扎实的知识教育的人才,具有广博的通识教育知识和厚实的学科基础教育知识,在此基础上形成开阔的知识视野和触类旁通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第三,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应该是体现了适用、有效的能力教育的人才,具有到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一线承担工作的能力,包括生产能力、适应能力、管理能力、交际能力等,除此之外还要具有创造性地发挥这些能力的实践经验。第四,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应该是体现了创新教育的人才,具有自觉的创新意识、较高的创新能力和强烈的创新追求,这一切体现为创新精神,只有具备了创新精神,他们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应用型人才的作用。

培养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关键是要打破以往人才培养模式的限制,切实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立新的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与环境。德州学院在这方面的做法是经过充分的社会调研,着眼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首先从理念上清醒地认识创新性应用型人才是什么样的人才,确立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然后根据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规格制定相应的培养方案,采取具有较大改革力度的培养措施,构建科学的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形成完整的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体系。现在出版的这部著作,就是我们多年研究和实践的结果。

这部著作在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上有以下几点可供参考:第一,本研究把对创新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放到国际、国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视野中来看待,提出创新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基于我国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高等学校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第二,本研究具体考察了地方性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优势与特色,提出面向地方、区域、行业、职业的需求,培养创新性应用型人才是地方性本科院校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这类学校深化教学改革的努力方向。第三,本研究基于德州学院在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的教学改革实践,提出了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思路与举措,初步构建了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模式和教育教学体系。第四,本研究根据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把对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落实具体化到实际的教学实践中,在涉及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实践教学、创新活动、质量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设想。



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对地方性本科院校尤其是一批新建本科院校的教学改革或许能够提供一定的启发。

对大多数地方性本科院校来说,应用型人才培养似乎已经成为大家的办学共识,但是在应用型人才培养这个大前提下,如何能够着眼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地方、区域、行业、职业发展需求,更好地准确调整自己的办学目标,办出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则是一个更加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提出,正是试图应对和解决这一课题的一个尝试。当然,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作为一个新课题,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实施过程中,肯定会遇到更多复杂情况和难题,这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找出解决的思路与办法。这些内容肯定是目前的研究成果无法一一涵盖的。

目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在高校中已成烽火燎原之势,很多高校都取得了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宝贵经验。今后我们一定要在学习和借鉴兄弟院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校自身的办学实际,进一步加大对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力度,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尽上我们的绵薄之力。

季桂起

2012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1)
第一节 国内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沿革与现状	(1)
第二节 办学主体多元化与新建本科院校诞生	(8)
第三节 应用型本科教育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14)
第二章 建设“创新型国家”与创新型人才培养	(31)
第一节 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	(31)
第二节 高等教育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中的定位	(37)
第三节 创新型人才与“创新型国家”建设	(41)
第三章 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规格设计	(55)
第一节 人才培养模式界说	(56)
第二节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59)
第三节 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规格设计	(64)
第四节 德州学院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规格设计	(69)
第四章 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85)
第一节 人才培养方案的内涵及结构	(86)
第二节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修订	(88)
第三节 德州学院人才培养方案的优化与管理	(109)
第五章 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构建	(116)
第一节 课程与高校课程	(117)



第二节 高等学校课程体系构建	(126)
第三节 德州学院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140)
第六章 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	(165)
第一节 实践教学的内涵及其育人作用	(165)
第二节 高等学校实践教学现状	(172)
第三节 地方本科院校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183)
第四节 德州学院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体系	(188)
第七章 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创新素质培养	(204)
第一节 创新素质	(204)
第二节 高等学校创新素质教育	(208)
第三节 德州学院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创新素质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220)
第八章 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	(232)
第一节 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	(232)
第二节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	(242)
第三节 德州学院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	(247)
附 录	(276)
附录1 德州学院2011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276)
附录2 德州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案例	(298)
附录3 德州学院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系列管理文件	(309)
参考文献	(358)
后 记	(361)

第一章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等教育发展的这一页历史,记载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伟大战略引导下全面发展的有力见证。1999 年国家教育部正式出台了关于高校扩招的重要举措。当年的招生计划数比以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在这之后,全国各高等学校充分挖掘教育资源潜力,积极改善办学条件,努力加大教学投入,使得高等学校的办学规模迅速扩大,招生数量成倍增长。截至 2005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7%,开始进入世界公认的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随着中国高校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至 2010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 26.5%,逐步接近普及化的高等教育。面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教育部及时做出了内涵发展、注重质量的高教发展战略调整。因此,分析国内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沿革与现状,探讨办学主体多元化与新建本科院校的诞生及发展的历程,研究应用型本科教育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地方本科院校科学确定办学定位、承担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国内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沿革与现状

一、国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沿革与现状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发表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量的发展和质的变化》,总结了西方若干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



历程,提出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划分:如果高等学校只能为 15% 以下的适龄人口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就处于精英教育阶段;在 15% ~ 50% 可视为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当高等学校接纳的学生占适龄人口总数的 50% 时,高等教育就进入一个历史性的时期,即普及化教育阶段。马丁·特罗先生还得出这样的规律:当人均 GDP 低于 1000 美元时高等教育一般处于精英化阶段,当人均 GDP 在 1000 ~ 3000 美元之间时高等教育开始向大众化阶段转变,而人均 GDP 在 3000 美元以上时高等教育才开始转向普及化阶段。他指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将会在财政和管理、学生入学和选拔、课程和教学形式、教师的职能、教师的培养和社会化、标准的制定与保持、考试方式与授予资格的性质、学生的住宿和工作安排、学习动机和学风、教学和科研的关系、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系、与成人教育的关系等方面发生变化。

一些发达国家是世界上最先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国家,这些发达国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高等教育已经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它们一般有较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较高的现代化教育程度,这些国家的适龄青年只要本人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和要求,并能够承担得起学费,就基本上能享受各种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美国是高等教育发展最快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国家。20 年代以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经济的崛起,为其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直接的推动力,加之美国是由移民组成的现代联邦制国家,灵活的、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高等教育管理机制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开辟了平坦的大道。早在 1940 年就超过了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的入学学生人数已占适龄人口总数的 16%。

法国与其他欧洲大国一样,二战以后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重建被战火毁坏的家园并致力于恢复经济,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开始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由于二战以后大量出生的人口在 20 世纪 60 年代陆续进入大学学龄阶段,大学学龄人口数量较大幅度的增长至少将法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限后推了好几年。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法国的高等教育也跨入了大众化阶段,比美国大约迟了 15 年时间。英国与法国的情况十分类似,其高等教育于本世纪 60 年代中期跨入了大众化阶段。德国也于 60 年代中期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美国的扶持及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使战后日本实现了经济起飞,对工程技术人才、各类管理人才的巨大需求,推动了日本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并于 60 年代中期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从高等学校在校生具体规模的变化来看,各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数量在跨入大众化门槛之前后一段时间均增长迅速。美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实现大众化之前经历了一段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发育期。在这期间的美国高等教育,诚如马丁·特罗所言:“当大众化高等教育到来时,为满足社会的需求,一下子就涌现了数以百计的学院。十多年后,一些学院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教师和设备,学校管理不善,培养出来的学生被社会认可程度不高,就读的学生数越来越少,就像经营不善的企业,只好宣告破产。但还有许多学院,一开始就考虑学生需要什么,应该教给学生什么,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吸引学生,把学校办得越来越好。最后,这些在大众化进程中应运而生的高等学校成功地生存了下来。”^①在 1950 年以后,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实现了大众化后仍以较高的速度扩大规模,在校生数从 150 万人增长至 1970 年的 850 万人,年均增长 9.06%。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的高等教育跨入了普及化门槛后,其规模扩张的速度才开始减缓。在 1970~1993 年,美国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年均增长速度仅为 2.3%,是 1950~1970 年间年均增速的 1/4。而欧洲法、德、英及亚洲日本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又各有特点。法国从 1962~1990 年,大学在校生人数从 28 万增长为 170 万,年均增长 6.65%,大学在校生人数占大学适龄人口的比重由 9.24% 上升为 42%。此后,法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展速度仍在加速,从 1990~1993 年,高等学校的在校生人数由 170 万增长为 208 万,年均增长 6.96%。英国从 1966~1990 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从 30.2 万增长为 126 万,年均增长 6.13%,大学在校人数占大学适龄人口的比重由 9.0% 上升至 27%。1990~1993 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由 126 万增长为 161 万,年均增长 8.51%。德国从 1961~1990 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由 56.3 万增长为 205 万,年均增长 4.56%;大学在校生人数占大学适龄人口的比重由 13% 上升为 35%。1990~1993 年,大学在校生人数由 205 万减至 188 万,年均递减 2.69%。

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发达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一个直接动因,甚至有人认为,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主要得益于发达国家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这虽然有些夸张,但至少说明了一个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反过来,一个国家高

① 转引自叶欣茹:《中国高等教育社会投入需求预测》,华中科技大学 2003 年博士学位论文。



等教育的大众化又给经济的发展以重大的促进作用。在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增长除了受到自然资源影响以外,主要取决于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等四个因素。在这四个因素中,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就取决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发达的高等教育大大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充足的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保证;发达的高等教育对科学技术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根据美国学者舒尔茨的研究,1900~1957年美国物质资本投资额增加约4.5倍,对劳动力进行教育和训练的投资增加了约8.5倍,而物质资本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增加了3.5倍,教育投资所获得利润却增加了17.5倍,国民经济增长额的1/3应该归功于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最高投资,没有对人的大量投资,经济增长以至整个现代文明就不可想象。稳步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和各种生产技能,从而大幅度提高劳动质量。

高等教育大众化,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竞争力、创业能力和适应能力,有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竞争不可避免,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就业竞争力显然高于其他人员。统计资料表明,在发达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失业率远远低于其他人员。例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水平的工程师中间失业率是4.4%,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中间失业率则为1.9%。例如日本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在1965年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分别占41.8%、46.8%、11.4%,但是到1975年分别变为9.1%、57.3%和33.6%。此外,教育投资具有高回报率。世界银行高级专家萨哈罗普对教育投资做了大量的跨国研究,认为1994年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世界平均的个人收益率为30.7%、17.7%和19%。曾经有人对广州市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不同学历毕业的人收入对比调查,结果是1:1.21:1.28:1.73。专家研究证明,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收入普遍比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要高1.5~2倍。教育作为一种投资对个人的回报率高达14.8%,对社会的回报率达9.5%。^①它的收益具有多样性特征,比如因为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增强,使人的生活层次和质量提高。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足够的人力支持和强大的发展后劲有目共睹。

^① 张琦:《国外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21世纪》2005年第5期。

二、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与特点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并快速实施的。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获得了巨大增长,为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日趋强烈。另一方面,当时由于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国内经济疲软,市场需求不足,为了刺激经济需求,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适时地将高等教育的宏观发展政策由“稳步发展”调整为“加快发展”,从而拉开了我国高等教育快速从精英阶段迈向大众化阶段的序幕。综观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清楚地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有别于其他国家,有其特殊性。^①

一是特殊的启动时间和速度。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启动的时间比西方国家大致晚了20年。西方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陆续进入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时代,并在20世纪70~80年代前相继实现了15%毛入学率的目标。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提出的,而且启动速度非常之快,这可以从我国启动大众化以来的高等教育招生的增长率得到证实。1999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比1998年增长了47.3%,2000年为38.16%,2001年为21.61%;而在西方甚至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国,在大众化的发展过程中,年增长率一般都在5%~10%,很少有年增长率超过20%的情况。另外,从毛入学率来看,许多国家是在9%~10%的时候,高等教育才有比较明显的增长,进而启动大众化进程。但对我国来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8%左右就开始了明显的增长。从国际上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5%上升到15%所需要的时间来看,美国用了30年(1911~1941),日本用了23年(1947~1970),韩国用了14年(1966~1980),巴西用了23年(1970~1996)。而我国仅用了3~4年的时间,这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具有短期内加速启动的特点,使得我国大众化的启动较其他国家更为急促和短暂。^②1999~2006年,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高潮期。8年内,高校招生数增长了4倍多,在校生数也增长近4倍,弥补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8年扩招,是对前50年高等教育发展缓慢的强烈冲击,是蓬勃发展的经济

① 贺金玉:《中国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② 张烨:《论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影响》,《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1期。



社会、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热烈期盼。8年扩招,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使我国高等教育迈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

二是特殊的动因和路径。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背后的主要动因是教育民主化浪潮、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等理论构成了大众化发展的理论基础。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完成基本上是在“高等教育是一项公益事业”的理念下进行的,尤其在欧洲的福利国家,高等教育被看成是“义务教育”和社会福利的范畴,政府承担了大量的财政投资和责任。由此可见,国际上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自然的、自下而上的渐进过程,是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的,教育资源的配置主要依靠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政府的作用只是在某个特定时期中的补充或引导。因此,通过市场的选择,高等院校基本做到了各安其位,使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形成了顺应市场需求的均衡发展的良性机制,从而也就呈现出了以多样化为主要内容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征。

我国高等教育增长的直接动因源于经济的要求。这一点与早期实现大众化的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在1999年实行大规模扩招的时候,正值国内经济发展的低谷,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因此,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可以通过延长教育年限延缓就业;第二,中国家庭向来重视子女教育,因此可以拉动部分消费;第三,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又必将在基础建设等方面拉动市场,也可以对经济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第四,从长远来看,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应该说,我国今天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人为”的过程,或者说在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府的行为,基本上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突变过程。

三是特殊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背景。首先,短期内的加速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使我们无暇顾及高校的办学定位,更来不及细致而深刻地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总结,只忙于显性层面上办学条件的满足。作为政府行为的扩招,更多的是考虑政府的行政行为,而作为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却少有顾及。目前,国家教育资源配置还很难与办学绩效挂钩,而往往根据隶属关系和办学层次进行行政性划拨,人为性因素很大。这样处于整个高教体系底层的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为了获得更多的办学资源,盲目攀比、升格就势在必行、在所难免。其次,中国特殊的传统文化背景和用人机制也助长了升格攀比风。作为缴费上学的学生及学生家长怀着强烈的

回报心愿,试图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高学生自身和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受“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影响,重学轻术,不顾个人兴趣和禀赋,盲目追求高学历,而用人单位也偏偏助长人才高消费,装点门面,而不是根据岗位需求,量才选拔,人尽其才。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高等院校难安其位,使高等教育层次分布的金字塔向着菱形的畸形态势方向异化发展。再次,就整个高等教育体系而言,我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渠道单一,有限的经费向少数被列为“重点建设”的高校倾斜;对高等教育学生资源的配置,则是从全国统考中分批次录取,优秀生源向“地位较高的院校”集中。这种体制使得各高校对有限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在定位上不断向“高”标准攀升,力争进入“高水平”行列,无疑是争夺资源最有效的手段。可以断言,只要这种体制性的问题不解决好,因争夺资源而引发的“攀高”现象必定会有增无减。

四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在原始基础、条件积累和进程轨迹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首先表现在基础条件差。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高等教育得到快速发展,这在时间上比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晚,然而所处的基础条件却相差甚远。这包括整个国民经济基础薄弱、人口众多而且接受基础教育的数量极少、整体文化水平很低、政府缺乏发展高等教育的人才和经验等等。这些条件的限制使得我国经过十年的努力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仅从0.37%提高到1.9%。其次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很不平稳,波动幅度大。如:1956年全国高校招生18.5万人,比1955年长88.8%,1957减到10.6万人,1958之后再次快速增长,到1960年达到32.3万人。进入60年代,在世界许多国家进入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高等教育却走进了低谷,1961年减少到16.9万人,1962年则降到10.7万人,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降到几乎为零。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高等教育入学率开始回升,80年代之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步入正轨,进入了较为稳定的迅猛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年平均增长为8.5%,1999年出现迅速膨胀的现象,普通高校招生从上一年的109万人扩大到160万人,增长率为47%。2000年在1999年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规模,招生人数达204万人,比1998年招生总量翻了近一番。纵观我国高等教育六十多年的发展,这样大的随意性和波动性在世界其他国家是鲜见的。再次表现为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欠合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表明,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教育层次结构与之相适应。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前夕,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是基础性教育;在经济起飞时期,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是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在经济起飞完



成后,进入经济发达时期,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是高等学科性和职业性教育。我国现阶段的教育层次构建与我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现状很不适应。在教育发展理念和政策制定上,偏重于文化教育特别是高等文化教育,而放松了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片面追求少量精英式的教育成果,而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大批不能上大学的劳动者接受继续教育,特别是他们就业所需的职业教育的要求。

第二节 办学主体多元化与新建本科院校诞生

一、办学主体多元化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

多元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办学主体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的内外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变和过渡。随着改革的深入,高等教育开放的程度也越来越高,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阶段过渡,高等教育投资主体也开始由单一走向多元。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人数不断增长,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迅速,每年均以25%以上的速度增长,这种高速增长造成公办学校各种软、硬件负载超重,同时由于国家财政支持较为困难,高等教育的规模效益虽有一定的提高,但也产生了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学生的文化知识面不断地扩大,但基础知识的厚度有待加强;学生的外语、计算机的基础水平有所提高,但实际运用的能力还不够;学生的学科知识面有所拓展,但专业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因偏重于学校教育及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实践能力薄弱等等,不一而足。教育质量是大学的生命线,没有质量的规模是一种无效的规模,是一种浪费,而没有规模的质量是单薄无力的、缺乏基础的质量。高等教育办学质量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高等学校自身要走内涵式与外延式相结合即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的路子;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多元办学,反映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特征。目前,按照我国各类院校分类方法,一般有四种:第一种是按照办学属性层次分为教学型院校、教学研究型院校、研究教学型院校、研究性院校四类;第二种是按照学科分类分为专业类、文科类、理科类、文理类、综合类五类;第三种按照办学目标类型分为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普通本科院校和综合性大学三类;第四种按照办学主体分为公办院